

“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奖感言(一)

【巴西】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我很荣幸获得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颁发给我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奖”。值得称赞的是,由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学家成立的这一平台,10年来一直与占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抗争。新自由主义理论使得经济理论倒退到18世纪。在当时,“自由市场”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中能实现“理性经济行为”的一个理想工具。欧洲资本主义试图证明,有可能根据“自由市场”原则建立一套经济制度。他们据此认为,这种社会是人性本质在真实世界中的体现。

重要的是,13年前,我们在巴西成立了巴西政治经济学学会,并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与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我们共同努力成立了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学学会,这也成为经济理论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正逐步形成一种态势,使我们摆脱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被标榜为“科学”真理的愚昧的经济政策中解放出来。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人的理念享有极大声誉,因为依附理论代表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正式理念面临着巨大挑战,这在瑞典政治科学家Bjorn Hetne有关这一理论的详细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对创立这一理论一直存在许多争议,但是,毫无疑问,理论所带来的贡献是很重要的。加拿大社会主义学家Lawrence Aschules曾说:“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是呼吁依附理论的第一批理论家;其他人紧跟其后,并使该理论得到扩展,尽管仍然年轻,但我们认为他是该理论之父。”

总之,这些年来,我的理论已经对拉美社会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俄罗斯哲学家Chestopol写道:“巴西社会主义学者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是新依附理论杰出的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拉美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同仁来说,他的著作也是拉美社会科学的象征。”

我的思想具有全球意义,因此,在马拉加大学经济学院网址上,我成为了

收稿日期:2013-5-25

作者简介: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1936-),男,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顾问。

历史上这一科学领域 250 名伟大经济学家之一。

我对该区域社会著作的贡献是：由于我多年流亡智利和墨西哥，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描述了这个区域的独特特征。因此，我决定把几篇文章集合起来，组成一本英语著作，名为《最基础的著作：世界体系、帝国主义和依附性》。我希望在这里，请允许我对我的著作进行综述，期望这一科学贡献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著作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几点：

第一，我在学术上的贡献之所以被认为很重要，是因为使用了跨学科的方法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及哲学家都认为这一方法论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学科。它也对解放理论和解放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也对这一方法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我引进使用和方法上控制抽象层次，将其作为辩证探求法的基本要素。美国马克思主义杂志《科学与社会》把我运用这一方法所提的社会阶级概念的文章称作“经典之作”。

第二，该理论的发展，解释了拉美物质和经济方面的落后，试图证明拉美的落后与其结构同样依附世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我指出这种依附究竟如何演化成为日益复杂的形式，从商业及金融的依附到工业的依附，如今是科技的依附。因为不同的阶级结构、不同的阶级，及占优势和主导地位的群体，这些安排导致了各种各样社会形态的依附。

我已经表明，这种落后状态(表现为不发达)和依附与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的全球霸权中心的形成和固化有关联。全球霸权中心造成了不同的地理政治区域，同时由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全球霸权中心也在不断变化。世界体系理论在当今国际社会思想中影响巨大，在我的部分著作中，我不断发展和改进该理论。

纵观历史，我已经证明这个世界体系以长期和短期的周期性运动得以发展。这些周期性运动也解释了全球体系演变的每个阶段不得不面临的地缘政治霸权，也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的推动下，科技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分析了科技和社会—经济的作用，并基于不同人群和不同国家，对建立全球文明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

正如这段时间我所证实的那样，依附性不是人们经常所认为的“外在因素”。在早期著作中，我已经有过描述，应该通过明确自身特定的运动来处理国家形势。运动发生时，国际形势被当作是基本情况而不是国家过程的造物主，因为它是一个国家内部决定国际形势影响国家现实的基本要素。外部动力代替内部动力很容易。如果可能，我们不需要对全球过程的每项运动的辩证法进行研究。

必须超越单一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只是从霸权中心的角度分析问题。所以，分析依附性及其动态性会获得充分的理论科学价值，而且，这被当作研

究国际资本主义秩序和地域表现的基本工具。这也使得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是由不同阶级和经济上的不平等组合起来。

我参与了全球“和平研究”的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我的著作成为复兴与和平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我也参与了建立拉美区域协作与亚洲区域协作,曾担任巴西和平研究协会主席。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大学、和平大学及其他机构的顾问,我参与并讨论了一系列主题,此外,也参加各种关于和平、区域与世界安全教育的活动。

我在著作中提出了“地球文明”这一概念,它成为形成较高文明这一建议的概念基础,这是现有文明收敛的必经阶段,却又不失其基本的特性。从实践结果来说,重要的是考虑和平问题成为讨论世界未来的重要主题,并常常在政治辩论中考虑。所以,领导者们及其他公职人员,有必要对依附性和全球化有个清晰的了解,尤其是在他们没有很好了解这一理论取得的成果的背景下。

我一直反对并驳斥当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我一直从事知识和政治革命活动,而这却使我成为被一直谴责的相关政府的政治迫害对象。1964年4月,我被列入巴西利亚大学首批解雇人员名单,紧接着发生了军事政变。在许多巴西军事政权变动的过程中,我遭到谴责,最严重的是在茹伊斯迪福拉军事法庭上,作为县城危险分子渗透的知识分子导师,我被判刑15年监禁。尔后,我被迫流亡智利,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工人政治”的其中一位领导者。此后两年时间,我一直参与地下行动反对这一军事政权。1961年,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POLOP成立,该组织为重新定义巴西和拉美左派提供了基础理论和政治指导的作用。目前,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及不少政府成员,都曾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中发起过政治斗争。

在智利,作为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领导的社会党的参与者、Chile Hoy 周报的创办者和投稿人、智利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以及巴西海外的反抗人员中最积极的组织者,我非常憎恨法西斯右派,因为在1973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期间,他们将我放在政治迫害的首批名单中。由于不能参与国内的反抗运动,我被迫流亡在托里霍斯将军领导下的巴拿马使馆,离开巴西之路受到了阻碍,直到6个月后,终于才拿到总统路易斯·埃切维利亚签发的前往墨西哥的签证。

在我流亡墨西哥期间,也就是从1974年到1980年,主要是通过拉美团结委员会,COPPAL(我代表这次运动重组了巴西劳动党),我投身于与该区域军队独裁的抗争中。此外,我还积极参与几项支持智利和巴西团结的运动。我也积极参与第30次经济学家国际协会的活动,以及其他与不结盟运动有关的运动。由于这些活动,我努力理解了一些问题,它们对我的学术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由于1979年投票支持大赦,我返回巴西,参与成立了民主工党。我参与

撰写了这一方案和宣言,成为国家委员会和米纳斯吉拉斯州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82年,我成为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的候选人。期间,我竭力支持对智利独裁制度的反抗,支持尼加拉瓜的桑地诺(Sandino)主义者,支持古巴不支付外债的国际运动,最终在里约热内卢州获得了政府的职位(成为 FESP-RJ 的培训主任,也是里约热内卢州国际关系的秘书)。自从 2002 年起,该州民主工党和我现在的政党一直领导州政府。

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大学来组织一个关于全球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者网络。最终在里约热内卢,我作为这一组织的负责人,各国的研究者、研究机构及教学机构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当前,我是维护人权这一组织网络运动的创始人,其成员分部在玻利瓦尔、委内瑞拉和古巴,这里聚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共同反抗美国对其他国家声称的虚伪霸权主义,因为它正以如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威胁着全人类。除此之外,实际上要努力理解人类的未来,也就是说,要理解我们的理念思想所带来的主要贡献。最后,还是要感谢大会授予我这个奖项。我会继续进行这一知识和政治的斗争。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译)